

变化中的中国人——西方的中国形象

（美）E. A. 罗斯

时事出版社

“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总序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

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

“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

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 19 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

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

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 言

那些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的人肯定会这样认为：在中国，任何一位西方人仅仅通过 6 个月艰辛的旅行与采访是不可能了解中国人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我在这儿生活了 30 年，但住得越久越觉得不了解这儿的人们。”一位商人说：“我原以为在这儿生活几年后，会了解他们的，但生活得越久越觉得他们不可理解。”任何一位外国旅行者如果请教一下长期居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的话，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勇气写关于中国人的东西。

其实，对于那些了解东西方人心理素质差异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并不难理解。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心理素质是以另一种文化或另一种社会组织为背景的，因此与西方人的心理素质迥异。如果把物质条件方面的优劣与基本观念方面的差异考虑在内的话，在中国人所处的环境下，我们西方人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东方国家的一些人非常重视这样的一种说法：由于心理素质的差异，黄种人与白种人永远难以互相理解、互相同情。而那些对东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对中国社会诸多

方面进行研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建立在对以下方面的考察和研究之上：闭关自守、激烈的生存斗争、祖先崇拜、父权、女性的从属地位、军事的衰退以及士阶层在社会中的优势等。

E. A. 罗斯

01 / 中国一瞥

中国具有欧洲中世纪时代的种种特征。所有城市都有围墙，时至今日，这些围墙和城门仍完好无损，并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满洲人是中国的统治者，他们总是把军队的营部安置在带有城墙的要塞城市中，一旦猝不及防的叛乱发生，他们便退入营部中避难。

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在华北，街道上一些仅供载客用的硬板马车川流不息，马车实际上是由骡子拉着。而在那些种植水稻的地区，人们并不喂养骡子，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城市中，人们只好步行或以手推车代步。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规定，所以，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用具的手艺人充塞其间，致使一条 6 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要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坐轿留出过道，道路会更加狭窄。

狭窄的街道总是拥挤不堪，给旅游者留下的印象是：城市中人口众多且高度密集。城市中的建筑主要是平房，除北京外，中国的其他城市面积很小。外国旅游者为了追求文学效果，在他们的游记中随意夸大了中国城市中的人口数量。这些不可靠的统计数字，都是旅游者随意猜想的结果。

直到最近，城市中才设置了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他们身着黄褐色卡其布服装，手持警棍在街上巡逻。但这些警察的能力在骚乱发生时从未得到过证实。在广州，人们所看到的士兵是这样的形象：无精打采，赤着脚，面色和善。他们绝对不能体现出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城市中没有公共用水。在那些位于河边的城市中，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每天专门负责挑水的人把河水分送到家家户户，从桶内泼出的水整日把通往河边的石阶打得湿漉漉的。当挑来的河水过于浑浊不能饮用时，人们一般用装有明矾块并带有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搅拌几下，使水慢慢澄清。

城市中没有公共照明设施。入夜，街道上漆黑一片，阴森凄凉，行人绝迹。在中华帝国各地尚未广泛使用煤油进行照明以前，人们一般用蜡烛做的纸灯笼，或者点燃花生油碗内的棉灯芯照明。由于没有良好的照明条件，多数人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煤油为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夜晚，人们可以读书，全家人也可以聚在灯光下谈天。

城市的燃料极其匮乏，整齐而成捆的干木柴成为商品。

无数满载木柴的小船沿西江顺流而下，把薪火运入广州和香港。随着伐木者不断逆河拓远他们的水路，森林毁坏的程度愈加严重。由于燃料的缺乏，可以燃烧的草木均得到了充分利用。谷糠、干草、树枝、树叶及其他杂物用于冬日夜间烧炕取暖，同时，人们可以在炕头的砖炉或泥炉上烧水、做饭。由于燃料不足，穷人家对燃料更是节俭，他们养成了以大街上出售的熟食为主食的习惯。因此，城市中流动的小吃摊的生意异常红火。而我们西方人对于大街上出售的熟食存有一种偏见，认为它价格昂贵，并非是一般家庭所能享受的奢侈品。

在中国内地，居民家中没有烟囱，凡是做饭的地方，墙壁总被炉中冲出的烟雾熏得漆黑。内地的人们对于室内的黑暗习以为常，因为房屋的门窗没有玻璃，不能使光线充分进入室内。人们保持室内亮度的惟一方法是在窗棂上贴上白纸。室内的地面完全是由泥土、砖或瓦铺成的，屋顶以瓦或茅草为原料。在我们这些过路人看来，内地人的生活显然并不安逸，更谈不上奢华。富有之家漂亮的房屋与庭院都由高高的围墙保护着，一般人很少能窥见这些房舍的华丽。在内地，没有用于公众消遣的修理得整整齐齐的草地和花园，只是偶尔在庙宇中有一些树丛。

内地的富有之家，尽管不乏漂亮美丽的东西，但以我们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这些美好的事物远不够整洁、雅致。佣人们对于蜘蛛网、灰尘、破损的用具并不在意，主人对此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内地人豪华的巨宅中，可能拥

有价值连城的瓷器，陈列着精美的刺绣以及世界上最漂亮的家具，但一般说来，这些仅受过中国传统工艺熏陶的内地人的优雅，与西方同等阶层是无法相比的。

在保持事物的整洁方面，中国人和日本人有着极其明显的不同。中国人对于如何照料和修理事物似乎毫不留心，甚至一无所知。他们从来不遵循“及时一针顶九针”的箴言，宁愿建设新的东西，而不愿保持旧有的事物。提起“中国”二字，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以下种种情景：用破烂的草席搭起的不蔽风雨的小船，倾斜的颓壁残垣，下陷的庙宇屋顶，松散而长满苔藓的泥瓦，高低不平的路面，破烂的草屋，腐烂中的顶篷，东倒西歪的祭坊屏饰，以及断裂、倾斜的石头路面。而在日本，任何东西看上去极其整洁干净。草屋修理得整整齐齐，墙壁冲洗得干干净净，草地明亮洁净，路面平平整整，没有随处乱堆的垃圾。我觉得世界上只有荷兰、法国的诺曼底、英国的某些地方的环境才能与日本整洁的环境相媲美。1910年8月那场令人难忘的洪水后，日本人爱整洁、办事井然有序的美名更为世人称赞。

在日本的村庄，人们看不到在中国大多数乡村随处可见的这些街景：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水池，泥坑，下陷的屋顶，倒塌的墙壁，腐烂中的草屋以及散乱的碎石。在日本，一旦屋顶、墙壁、围栏、树篱、水坝、桥梁、小路等受到损坏，立即会得到修复。只有新英格兰人和美国侨民居住的地方的环境堪与日本相比。

在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种极其耐穿的蓝色棉衣。老百姓都穿质地粗糙的深蓝色“本色布”。精制的淡蓝色棉衣或色彩艳丽的丝质外衣便是中国人的节日服装。冬季，穷人穿的是厚厚的棉衣，而富家子弟则穿裱有毛皮的丝绵袄。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西方人穿毛料的衣服。但如果让一般的中国人也穿西式毛料服装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现在并不准备大规模养羊，他们生产出能满足自己需要的羊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人穿的棉袄不像西方人那样在前面留有开口，而是在侧面开合。在北京，当强劲的西伯利亚寒风侵袭时，你会觉得西方人在大衣、上装等的正中间留上一个V型开口是多么愚蠢。显然，它把人们娇嫩的喉咙和胸口暴露在无情的严寒面前。当你看到这些明智的中国人用棉衣把他们的前身整个裹住，并系紧肩膀上的扣结，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衣不蔽体的图腾崇拜者。

只要有石头的地方，沿途你就会看到一些横跨主路的纪念性拱门。这些建筑就是经过官方许可后建立的名闻遐迩的“牌楼”。人们以此纪念某种行为或某人高尚的一生。但只有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文人学士死后才能受此殊荣，那些荣立战功的兵士死后却享受不到这样的礼遇。牌楼中门两侧各有一两个与中门样式十分接近的小门。所有的门都十分精美。由于结构坚固的牌楼可以耸立几个世纪，还由于建立这样的纪念物是那些博爱的中国人的几种原始的资金消费方式之一，因此，牌楼越积越多。在一些靠近城



横跨大路装饰典雅的牌坊

市的路段上，耸立着许多样式单一的牌楼，尽管它们很漂亮，但有时人们也会对这些单调的重复感到厌烦。

在华南的城市中耸立着一些六七层高的平顶塔楼，塔楼四周有壕沟，上端留有小天窗。它们鹤立于简陋的平房之中，宛如欧洲中世纪城堡中的高楼。城市中的当铺可以起到银行的作用，也可以当作贵重物品的保险处，当你遇到强盗时，也可以在此躲避一时。在中国的一些较大的城市中，有一些华丽的行会大厅和外省人建立的装饰典雅的会馆，这些外省人如同 13 世纪在伦敦谋生的比利时佛兰芒人或汉萨商人一样，感到自己是身居他乡的客人。有时，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们联合起来建立他们的会馆，我记得在

西安府有一座富丽堂皇的“三省会馆”，聚居着来自四川、河南、山西的异乡客。

由于没有好的公路和可以负重的牲口，人们不得不依靠水路交通。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河流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利用，因此，中国的船特别多。其数量可能相当于世界上其他地方船只数量的总和。中国船民的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从事水上劳作的劳动力资源。河上有许许多多人力驱动的舢舨，划桨的人总是站在甲板的前头。较大的船需要 16 或 18 人划桨，船夫们裸露着上身，一边唱着船歌，一边有节奏地划桨。有时他们顺着强劲的风行船，有时船夫们只好沿着河岸牵引着船只逆水而行。由于没有先期修建好的纤路，船夫们只好沿着陡滑的河堤爬行，他们攀登着河岸的岩石，沿着窄狭的壁架，徐徐前行。船夫们一边爬行，一边用力拉着船，实在痛苦不堪。

在南方，失去了土地的人们被迫移到河上居住，无数的人在舢舨或船上安家，度过了他们的一生。遇到好天气，这些贫穷的人们像是住在两端带有游廊的单间房中，他们与陆地上的人们一样，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这里，人们不必担心会遭到地主的解雇，没有雇主来压榨他们，也没有工头催促他们快点干活。在河上、岸坡上，人们过着忙碌而丰富多彩的生活。潺潺的水声，船与船之间的震颤声，婴儿的呀呀学语声，以及大人们喋喋不休的谈话声，使这儿的人们从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因为河水的便利，船上的

家家户户都非常洁净，其整洁的程度像荷兰人家里一样。只要他们愿意，不用支付租税，船户们就可以换一换他们的邻居、住所以及四周的环境。没有人比他们更自然，更活跃，更自由自在，因为他们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困窘，即使在贫穷困苦中，他们仍保持着自己的自由。

他们的孩子，那些水上的流浪儿，智力在很早时就得到了开发。婴儿出生不久，父母就把他们拴在一个封着口的空坛子上，万一小孩掉入水中，大人们可以根据坛子在水中漂浮的位置将小孩救起。那些满周岁的孩子已懂得如何照料自己。到三四岁时就能摆弄船桨和用于撑船的竹竿，他们已像我们国家六七岁的孩子那样机智。任何东西都逃不过孩子们那善于窥测的黑色眼睛，他们能够像意大利婴儿那样讨人喜欢地哄走你手中的铜钱。

尽管中国的城市每到夜间总要关上城门，但城里人绝不像我们西方人一样与广阔的农村断绝往来。在中国，城里人绝不会轻易与他们农村的血亲失去联系。前不久，香港的造船和修船业不景气，但这并没有给码头的失业者带来致命的打击。他们之所以能度此难关，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其他工作，而是因为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分散到他们祖先世代聚居的农村。在那里，这些失业者重操前人的旧业，直到形势有所好转。农村的大家庭总是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并维持其生存。但与这一家族母姓有关的血亲并不能享受这种礼遇，人们是不允许这些亲戚长期寄居下去的。